

制度如何影响创业：一个跨层次的分析框架^{*}

□ 杨 俊 牛梦茜

摘 要：制度如何影响创业是近年来创业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Hitt 和 Xu (2019) 在文中讨论了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创业行为（新创企业与在位企业）的可能性及其内在机制，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对于深化后续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价值。本文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围绕“制度如何影响创业”的跨层次机制展开理论探讨，并结合中国情境的历史特征与数字经济等新兴实践提出了研究展望和建议，以求推动和丰富针对这一主题的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关键词：制度；跨层次；创业；组织场域

一、引言

通俗意义上讲，制度就是“游戏规则”，这一游戏规则会影响到个体或组织的行为选择、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North, 1990; Scott, 1995）。有关制度如何影响创业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区分出两股潮流：第一是采用制度理论来解释微观层次的创业行为和战略选择，这类研究的假设简单直接：创业和新企业面临着新进入缺陷问题（Stinchcombe, 1965），因此有必要策略性地遵守既定制度来赢得和提升合法性，最终谋求新企业的生存和成长（Zimmerman & Zeitz, 2002），这类研究主要被战略和创业等管理领域学者所主导，随着研究的深化进一步涌现出了制度创业等新兴研究主题（Greenwood & Suddaby, 2006），旨在探索打破既有制度约束并推行和建构新制度的创业过程。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形成过程与成长路径”（71732004）和“网络及不确定环境下创业者的行为认知与决策机制研究”（71532005）资助。

第二是探索国家或地区层次的制度特征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这一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创业活动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具备的突出功能（Shepherd, 2011），这部分的研究主要被经济学家所主导。这类研究背后的假设更加明确：在任何经济体中，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创业活动的供给，在供给约束条件下，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往往取决于创业活动的结构特征，即生产性创业（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非生产性创业（un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与破坏性创业（destructive entrepreneurship）的构成比例（Baumol, 1990）。换句话说，国家或地区等多层次的制度或政策更重要的影响并非是创业活动多寡，而是如何改善或提升创业活动的质量。Su等（2017）发现有46%的文献都专注于国家层次的制度因素对于创业活动的影响，尽管这些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结论，但仍不能充分揭示国家层次的制度因素影响微观层次创业行为的传导机制（Bjornskow & Foss, 2016）。

制度必然会影响到创业行为和结果，这毋庸置疑，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可能会影响到创业的哪些行为或特征，我们也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研究知识，面向未来，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揭示制度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的复杂作用机制（Hitt et al., 2018）。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正如North（1990）所言，制度本质上是人为设计的行为限制（humanly devised constraints），揭示并了解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为何在相似制度情境下微观层次创业行为仍然存在差异的事实（例如：在弱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为何有的行业及创业者在行为上以创新为主导逻辑

而在另一些行业及创业者却是模仿主导），进一步地，基于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揭示制度如何影响创业的过程机制还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谨慎地设计或制定与创业相关的制度和政策。

本文以Hitt和Xu（2019）在《管理季刊》上发表的《制度与创业战略》一文为基础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这是一篇理论性文章，旨在探讨“制度如何影响创业”这一基本而重要的问题，在分析和讨论这一问题时，两位学者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为基本出发点，基于制度的多层次性、多元性以及动态性的基本判断，重点讨论了制度复杂性（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创业行为（新创企业与在位企业）的可能性及其内在机制，在区分制度影响创业的直接效应和复杂效应的基础上，强调未来研究在探索“制度如何影响创业”这一问题时，有必要从单一制度分析转向多元制度的复杂效应分析，从单一层次的制度分析转向跨层次制度的组合效应分析，从制度效应的静态分析转向考察制度效应的动态和演化效应，最后，两位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有待未来研究探索的研究问题，为未来研究指明了努力方向。

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一方面体现在系统地阐述了制度复杂性及其影响创业的多重机制，另一方面为战略和创业学者开展有关制度如何影响创业的传导机制的研究设计产生了重要启发。本文沿着这篇论文的思路，继续围绕“制度如何影响创业”的跨层次机制展开理论探讨，并结合中国情境的历史特征与数字经济等新兴实践提出了研究展望和建议，以求推动和丰富

针对这一主题的国内相关研究进展。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理论讨论局限于个体创业，以公司或组织为情境开展的创业活动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目的是在区分个体创业与公司或组织情境下创业差异基础上突出重点。因为与个体创业相比较，制度因素对公司或组织情境开展的创业活动的传导机制可能存在重要差异，这一差异可能来自公司或组织已有的资源、声誉以及合法性，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公司或组织在应对制度压力或利用制度机会时有着更加丰富和从容的战略选择（Oliver, 1991），未来研究探索针对制度如何影响公司或组织情境下的创业活动，很有必要将公司或组织情境纳入分析框架。

二、制度影响创业的跨层次机制

基于新进入缺陷的事实，与大公司相比较，创业和新企业更容易受到制度变化或变革的影响，这是基本事实，更重要的是其影响效应复杂有趣。Hitt 和 Xu（2019）在文中强调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影响创业的复杂效应，这一复杂效应除了来自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还来自于宏观制度作用于微观创业行为的跨层次问题，在宏观制度向微观创业行为传导作用的路径中，多元主体的行动让这一路径变得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动态性，这是诱发在相似制度情境下宏观层次或中观层次创业活动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弄清楚制度如何影响创业的跨层次机制，才有助于我们解释和预测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会给创业活动带

来什么样的影响。

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更有助于提升创业活跃度？这是有关制度与创业关系的宏观研究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创业动态跟踪调查”（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等全球性调查项目的推动下，相关研究发展迅猛，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有关制度因素会给宏观层次的创业活动带来什么影响的理论认识，尽管大多数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远远不能充分解释实践现象。例如，经济自由化（economic freedom）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影响创业活跃度的关键变量（例如，Bjornskow & Foss, 2008；McMullen et al., 2008），但至今有关经济自由化对创业活跃度影响的认识并没有定论（Bjornskow & Foss, 2016）。在现实中，我们能感受到的事实是，并非自由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创业活跃度就越高（如日本）；也并非自由化程度相对不高的国家，创业活跃度就必然越低（如中国）。除了文化等其他非正式制度带来的复杂效应，还可能存在的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效应从宏观向微观传导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制度变革诱发的第一轮创业浪潮为什么会是以农民而非其他人群为主？关键就在于相对于其他更加有创业能力的群体（如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计划体制下的农民制度嵌入程度很低，一旦制度松动，农民更容易从中注意到的是机遇，而不是制度不确定性的风险（张维迎，2006）；中国近年来的创业热潮，除了技术和“双创政策”的推动和促进，大多数新生代创业者较低的制度嵌入在微观层面上仍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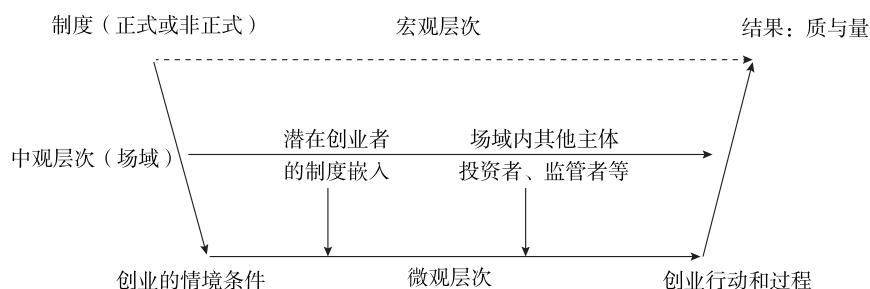


图1 制度影响创业的跨层次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改编自 Bjornskow 和 Foss，2016。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借鉴 Bjornskow 和 Foss (2016) 有关制度、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框架，提出了制度影响创业的跨层次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与 Bjornskow 和 Foss (2016) 相一致，本文认为图 1 虚线箭头所表示的关系是经济学家更擅长的研究话题，鉴于不同国家或地区内制度因素的差异比较，探索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制度对于宏观创业结果的影响，但对于战略和创业等管理领域的学者而言，可能也应该在“宏观—中观—微观—宏观”（也就是图 1 中列示的实线箭头部分）的跨层次作用链条中做出理论贡献。

根据图 1 所示的分析框架，①宏观层面的制度透过中观的组织场域来塑造微观创业条件。投资者和顾客等组织场域内的重要行动者会对制度进行认知和加工，这些认知和加工过程很可能会因投资者和监管者等身份和类别不同而存在差异 (Shepherd, 2011)，这一差异有可能会产生和塑造基于不同制度逻辑的制度扩散 (Purdy & Gray, 2009)。②基于在组织场域层次有可能形成不同制度逻辑的事实，潜在创业者对于制度逻辑的选择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

创业行动选择和过程特征，而这一选择很可能与潜在创业者的制度嵌入性高度相关。潜在创业者的制度嵌入性可以划分为结构嵌入和认知嵌入，前者描述的是潜在创业者依从或背离主导制度逻辑的可能性 (Uzzi, 1997)，可能表现为潜在创业者先前工作组织在组织场域中的位置 (中心还是边缘)。Cliff 等 (2006) 发现创业活动的创新性受到创业者先前工作组织的结构嵌入影响，往往在组织场域内边缘企业工作的创业者更容易谋求创新，而在中心位置工作的创业者则更倾向于模仿。认知嵌入是潜在创业者对其他的制度选择的意识、开放性以及挑战主导制度逻辑的动机 (Greenwood & Suddaby, 2006)，这可能取决于潜在创业者在创业行业内工作的时间长短以及业绩高低，相对于工作经验丰富或高业绩个体而言，行业新手或低业绩个体往往具备更低的认知嵌入性。更为重要的是，结构嵌入有可能会影响潜在创业者对组织场域内不同制度逻辑的选择 (主导还是非主导)，进而有可能会影响其风险规避倾向，认知嵌入则可能会影响潜在创业者重新认知甚至塑造场域内新制度逻辑的可能性，有可能会影响

其创新倾向。③基于潜在创业者制度嵌入性的差异，有可能会诱发其不同的创业行为选择和过程特征，这一差异性行为和过程特征会在制度化过程中进一步通过身份识别和范畴化而进一步分类组合，形成在组织场域内多重制度逻辑并存的事实，并最终聚合为宏观层次的创业结果。

从研究现状上看，有关制度与创业研究很有必要朝向跨层次方向努力，这是推动理论发展和检验的关键问题。事实上，Hitt 和 Xu (2019) 在文中结论和讨论部分提出的八个研究问题本身就在隐喻跨层次分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之相类似的是，Su 等 (2017) 有关制度与创业关系的文献回顾也指出，尽管近期研究开始关注到多重制度逻辑对于创业活动的影响 (复杂性)，但跨层次的研究非常匮乏，特别是对中观组织场域层次的分析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三、中国情境下开展相关研究的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变革和创业一直在交替演化，在制度变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创业活动的主体、类型、行为和结果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张玉利和谢巍, 2018)。面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向大国到强国的转变过程中，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的进一步推动和实施，制度变革必然会继续诱发创业和新兴企业的进一步演化，这些都为在中国情境下开展制度如何影响创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土壤。制度与创业关系研究已经超越了早期

研究关注新企业如何克服合法性障碍的问题，更加注重探索国家或地区间创业活动差异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的制度性成因，并借助这一探索来丰富我们有关如何通过优化制度体系来改善创业活动结构的理论知识，在这一背景下，基于中国情境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具备良好的研究条件，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为此，本文进一步归纳和提炼了 Hitt 和 Xu (2019) 给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带来的三点重要启示。

第一，国家层面制度与地区层面制度的二元性在中国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一二元性指的是国家与地区层面制度的差异性以及因此诱发的复杂性，这一事实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研究设计带来了严峻挑战，有必要在对制度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研究策略来揭示制度如何影响创业的跨层次效应。具体而言，有的制度的行业特殊性不高 (如企业注册的认缴制或破产制)，这些制度很可能在地区层面诱发制度逻辑差异，在此时，地区就有可能构成了跨层次分析框架中的组织场域层次，地区监管机构就是塑造差异性制度逻辑的主体，透过地区这一层次进一步下沉到微观探索对于创业类型或结果的影响，有可能会产生富有洞见的研究发现。有的制度具有很强的行业特殊性 (如新兴产业扶植政策)，在此时，尽管地区间制度仍可能会有不同，但这些制度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行业内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更高 (Leblebici et al., 1991)，特别是在中国这类制度或政策往往来自局部地区先进经验的制度扩散，行业内主要行动者塑造的制度逻辑差异就可能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行业就有可

能构成了跨层次分析框架中的组织场域层次，在通过地区分类等办法来控制地区间制度差异的前提下，透过行业这一层次进一步深入到微观探索制度对于创业的影响就显得很有必要。例如，在“双创”政策以及背后一系列制度的推动下，高校众创空间在过去几年里发展迅猛，但质量和效果参差不齐，高校本身及其参与者类型和行为差异诱发的制度逻辑差异（市场逻辑、竞赛逻辑或业绩逻辑），有可能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非正式制度是对正式制度的有力补充，特别是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会起到更加重要的替代作用（Peng & Heath, 1996）。这一观点背后隐藏的逻辑可能是与正式制度相比较，非正式制度具有更强的认知特征，更容易被认为是约定俗成的规则，更容易被个体或组织所理解和认同（Scott, 199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正式制度在不断完善，制度空洞（institutional void）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甚至在互联网等新兴行业领域的立法速度惊人，但同时诱发的另一个问题是，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更加突出，在这一情境下，有可能非正式制度仍然会继续发挥甚至有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除了 Hitt 和 Xu（2019）在论文中提到的文化、信任和关系等被研究关注较多的因素，价值观和信念等非正式制度对于创业活动性质的影响很可能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三，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应用更为普及的新兴行业领域，不少新兴企业有可能构成国家或地区制度向微观创业行为传导的重要中介，例如，阿里巴巴很难被定义成一家企业，因为

它所嵌套的大量参与者以及参与者之间形成的复杂网络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定义和塑造制度逻辑的中间体；小米公司的生态圈战略背后也是在传播并扩散特定的制度逻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兴企业起源自正式制度缺失或不足的情境下，其成长过程能够很好地展现制度与创业之间互动的共生演化过程，针对这些典型企业开展跨层次的比较定性研究有可能会产生重要的理论洞见，一方面丰富对于宏观制度影响微观行为的中观机制的认知，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加有关多元主体如何互动来塑造并变革制度的深层次机制的认识。

四、结语

“情境—行为—结果”是战略和创业研究的基本逻辑，从某种角度上看，对情境的不同理解产生了战略和创业研究的不同流派，在创业研究领域，制度学派关注的基本问题就是制度如何影响创业行为，尽管相关研究增长迅猛，但仍存在着较大的进步空间（Su et al., 2017）。特别是这一问题在当今乃至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必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 Hitt 和 Xu（2019）在文章开篇引言中所表述的，创业和创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国家、行业和企业之间竞争的焦点，如何营造鼓励和促进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制度制定者所关注的关键问题。回到最基本的层面，通过学术研究来揭示什么样的制度或双重制度交互通过什么样的传导过程更有助于激发创业活动并提升创业质量自然就具有重大价值，从这一点上看，Hitt 和 Xu（2019）一文必然会对国内相关

研究工作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也会进一步促进国内相关研究工作与国际学术社区的融合。

接受编辑：Haiyang Li、井润田

收稿日期：2019年5月12日

接受日期：2019年5月15日

作者简介：杨俊，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为创业与创新管理。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管理世界》7篇，JBV、SEJ等SSCIQ1区论文近10篇）。

牛梦茜，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Hitt, M. A., & Xu, K.: 《制度与创业战略》，《管理学季刊》，2019年第2期。

[2] 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权衡》，2006年第41版。

[3] 张玉利、谢薇：《改革开放、创业与企业家精神》，《南开管理评论》，2018年第5期。

[4] Baumol, W. J. 1990.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893-921.

[5] Bjornskov, C., & Foss, J. J. 2008. Economic freedom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Some cross-country evidence. *Public Choice*, 134: 307-328.

[6] Bjornskov, C., & Foss, J. J. 2016. Institutions,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do we still need to know?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 30: 292-315.

[7] Cliff, J. E., Jennings, P. D., & Greenwood, R. 2006. New to the game and questioning the rules: The experiences and beliefs of founders who start imitative versus innovative firm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1: 633-663.

[8] Greenwood, R., & Suddaby, R. 2006.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mature fields: The big five accounting fi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27-48.

[9] Hitt, M. A., Sirmon, D. G., Li, Y., Ghobadian, A., Arregle, J. -L., & Xu, K. 2018. *Institutions, industries and entrepreneurial versus advantage-based strategies: How complex, nested environments affect strategic choice*. Working paper,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exas.

[10] Leblebici, H., Salancik, G. R., & Copay, A. 1991.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organizational fields: An organizational history of the US radio broadcasting industr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 333-363.

[11] McMullen, J. S., Bagby, D. R., & Palich, L. E. 2008. Economic freedom and the motivation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ial ac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2: 875-895.

[12]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Oliver, C. 1991. Strategic response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 145-179.

[14] Peng, M. W., & Heath, P. S. 1996. The growth of the firm in plann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1: 492-528.

[15] Purdy, J. M., & Gray, B. 2009. Conflicting

logics, mechanisms of diffusion, and multilevel dynamics in emerging institutional field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 355–380.

[16] Scott, W. R. 1995.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London: Sage.

[17] Shepherd, D. 2011. Multileve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Opportunity for studying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37: 412–420.

[18] Stinchcombe, A. 1965.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In: March, J.,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Rand McNally, Chicago, IL.

[19] Su, J., Zhai, Q., & Karlsson, T. 2017. Beyond red tape and fool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1992–2014.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2: 505–531.

[20] Uzzi, B. 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36–67.

[21] Zimmerman, M. A., & Zeitz, G. J. 2002. Beyond survival: Achieving new venture growth by building legitima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7: 414–431.